

致君尧舜与皇权独尊

——解缙悲剧人生的历史解读

穆永强

(兰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解缙是明初历仕三朝的谏诤名臣,其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明初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历史条件下,解缙是君尊臣卑、嫉贤妒能的封建官僚的政治牺牲品,是“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条的牺牲品。

[关键词]解缙;皇权专制;官僚政治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20-02

一、解缙生平简介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明初大才子,江西吉水人。吉水解氏家族自从唐朝以来世代居住在吉水鉴湖南山之下,解氏家族是“世有科第”的文化世家,在吉水更有“唐宋诗书第一家”^①之美誉,堪称名门望族。解缙的祖父解子元,元代进士,安福州判官,“以名进士死节,赠中书平章”;父亲解开,国子生出身,元末辞参知政事,为一代大儒,学者称“筠涧先生”;母亲高妙莹,进士高若凤之女。解缙7岁就能作诗,且出语不凡,“诸生学士观如堵”,^②有“神童”之称。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未弱冠的解缙在江西乡试中拔得头筹,转年会试礼部中第七,殿试时主考官认为他的策论立论过高,结果放榜时被抑置第三甲。不过,解缙才子的名声早已尾巷流传,开国皇帝朱元璋特授他为中书庶吉士。

中书舍人制度是明代秘书制度的核心,中书舍人地位虽低,但在明代中央行政决策中作用颇大。作为皇帝秘书的中书舍人为近侍之臣,因专门负责誊写诏、敕、策、符、铁券而有机会参与中央行政决策。解缙在任中书舍人时还曾一度入直翰林文渊阁,“承乏词垣兼知制诰,亲闻上语”,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少年得志的解缙以唐虞三代的谏诤名臣为楷模,致君尧舜之心尤为迫切。他疾恶如仇,屡上封事揭发奸佞。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解缙因为对兵部尚书不够尊敬而被改授为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在监察御史任上,他先代同官上章,弹劾上司都御史袁泰;后又代人秉笔,替被皇帝诛杀的韩国公李善长打抱不平,以致“廷臣多害其宠”,不为同列所容。洪武二十四年(1391)五月,任御史不到三年,皇帝看到解缙不懂得官场上的韬晦哲学,

便以“大器晚成”相勉励,让他回乡读书,闭门思过,十年为期。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逝世。尊从诏旨归读八年的解缙进京奔丧,结果遭到权臣弹劾,被贬为河州卫礼房吏。

解缙在河州为吏仅一年有余,就对河州一带的士人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才华横溢,“诗文章书遗留”甚多,因此“河西士夫称不绝口”,且“有得其片纸只字者,藏以为珍玩”。^③解缙师法元末明初书法名家危素、詹孟举,其小楷书端庄精妍,行草、狂草独步当世。河州镇边楼上的“镇边”二字就出自解缙的手笔,其《登镇边楼》一诗被题写在镇边楼的匾额之上。

后解缙被建文皇帝从河州召回,为翰林待诏两年。“靖难之役”后,解缙迎附燕王朱棣,因为豪杰敢言和出色的文翰之才,被选入内阁,参决机务,后官至地位尊崇的翰林学士,成为与皇帝朝夕相伴的机要秘书,帮助朱棣迅速完成了从藩王到皇帝角色的转变,对于稳定永乐初年动荡的政治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解缙因为在立储问题上据理力争,卷入皇族内部权力斗争,被朱棣疏远;加之汉王朱高煦诽谤中伤,最终系狱而死,年仅47岁。

二、解缙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解缙是明代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君尊臣卑、宗族本位的大共同体社会封建官僚依附于皇权的社会人格,要求入朝为官者言事持中、谨言慎行,在皇帝没有表态前不能急于发表意见。而明初宰相制度的废除,使封建专制皇权高度膨胀,传统政治不断恶化,宦官和厂卫同流合污,特务政治公行,廷杖、诏狱、文字狱成为明代政治暴虐的标志,君臣关系

完全蜕化为主奴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中理学定于一尊,八股取士更使士大夫从思想上彻底认同和服从皇权。

《明史》列传部分的“传赞”充分显示,为时人和史家称许的“为官能持大体”的官僚无一不是谨言慎行,充分表现出臣子对主子的恭敬和顺从。

少年解缙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朝野上下万马齐喑的氛围。他忠心耿耿而又性格刚直,难免与皇帝的意志发生冲突,诸如上呈《大庖西封事》,指斥汉王“逾礼夺嫡”的不义之举,竭力反对皇帝劳民远征,诸种行为都属于批鳞逆心之举。结果他被皇帝加以“离间骨肉”的罪名,成了皇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大共同体宗族本位的传统社会,对个人个性和权利的扼杀十分彻底。^④这同样适用于解读解缙的人生悲剧。

(二)解缙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中国古代君尊臣卑和家族本位的大共同体社会形成了封建官僚亦主亦奴的社会人格,秉承“清、勤、慎”的官箴。这种社会人格决定了整个官僚集团的为人处事和行为趋向极其一致。

解缙疾恶如仇,喜欢臧否人物,不掩人过,勇于挑战封建官场以言为讳、论资排辈等潜规则,打破了整个官僚集团内部的平衡状态,进而影响到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他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解缙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可以借用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理论来解释:解缙虽为“负奇气、抱俊才”的“良币”,但是终因封建官场上“劣币”——阴阳两面的官僚充斥而被驱逐出局。

钱钟书先生的一番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官僚政治嫉贤妒能的本质和解缙人生悲剧的成因。他说:“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纷争,常表现为嫉贤仇美这一不治之症。女无论美丑,入宫见妒;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嫉。故平庸之徒可平安到老,而才智过人惨遭杀害者则属恒常事。”

(三)解缙是封建社会“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律的牺牲品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言谏和纳谏(或拒谏)的关系充

分反映了君尊臣卑的等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位卑言高则为罪”的言谏戒条,这就暗示作为上天之子和人间圣人的皇帝理所当然要比臣民更具远见卓识。因此,历代臣子进谏时形成了“言谏不露”的特点,即要求进谏者字斟句酌、委婉讽喻,不可触犯君主权威和显扬君主过错,否则必然为君主的权势所伤,因而封建史家和时人所称道的是宋濂那样“不激不随,从容详慎”的劝谏辅佐之臣。明人黄佐在考察了近侍阁臣的遭际之后,就曾经发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近侍内阁之臣尤难”的感慨。^⑤

解缙刚直不阿,在看到有皇帝撑腰的汉王的不义之举时,直言“是启争也,不可”,显得锋芒毕露。他博通经史,坦言“安南古羈縻国,不足置郡县”,与朱棣讨伐安南黎氏父子篡逆以昭示自己登极为顺天应人的举动发生强烈冲突,因此,被专制皇帝视为挑战其独尊权威和彰显君主过错的轻狂之徒,皇帝自然对其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历史上不乏像解缙这样敢直言的君子,在被贬谪后他就自比屈原、贾谊、李白这些怀才不遇的名节高士。这些被时人目为轻薄狂妄之徒的士大夫其实都忠心耿耿,只是没有顺从君主意志。解缙因直言被同僚视为异端,被不可一世的君主视为藐视皇权的狂妄之徒,被封建史家目为不识为官恭谨大体之人。

三、结语

探讨解缙忠君但不容于专制皇权的人生悲剧之成因,考察明初皇权高度膨胀历史条件下谏诤直臣的命运,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实质,剖析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效纳愚忠的臣子的忠君意识和甘作奴才的臣属意识。

封建史家认为,解缙乃“以言取祸”,^⑥即他身处内阁禁密之地,有口不密,泄露了皇室机宜,因而招致祸患。平心而论,解缙的悲剧与其刚直性格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将解缙的悲剧简单归咎于其性格的观点并未切中要害。解缙的悲剧在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深刻的社会原因。

[注 释]

①四库全书本《文毅集》卷5。

②四库全书本《文毅集》卷4《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③《河州志》卷2。

④秦晖:《从大共同体到公民本位社会》,载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力量》,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⑤《翰林记》卷2《密疏言事》:“内阁事功称三杨一李,然其所遭际可考也。夫惟声色不动而诚意潜孚,阅历既多而识见素定,乃可以当此,然亦难矣!为内阁之臣尤难。”

⑥参见《明史》卷147《解缙传》。